

# 2010年以来的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论评

郇庆治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通观2010年以来我国的环境政治研究,理论著述方面的成果或进展显然要更为扎实,相比之下,国外名著译介、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两个方面只能说是平稳推进,但亮点不够多。而从环境政治(学)研究的四大议题领域,即环境政治理论、环境政党与运动、政府环境政策、国际环境治理与合作来看,欧美国家的环境政策与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及其谈判,无疑是我国学者最为关注、学术成果也最为丰硕的两个议题领域。我国环境政治研究的主要阶段性进展或提升,一方面,是环境政治学同时作为一个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比较政治分支学科的事实性确立;另一方面,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未来成长与发展,还将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挑战与困难。

[关键词] 环境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绿色政治

[中图分类号] D0-05;X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8)01-0023-16

笔者曾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09年之前中国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围绕着环境政治理论、绿党与环境运动、政府环境政策与治理、国际环境政治与合作等五个议题领域,做过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概括<sup>①</sup>。由于其中完成的对于环境政治学意涵、主要研究对象及其所面临发展语境的理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而,本文将着力于概述这些方面研究自2010年以来的新进展,并分为理论著述、国外名著译介、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三个层面来展开论述,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以“百度学术网”“中国知网”所收录的相关学术文献与活动信息为主要资料来源或分析范围<sup>②</sup>。最后,笔者将对这段时间我国环境政治学研究的议题领域和方法论特点做出简要评论。

## 一、理论著述

### 1. 学术著作

在这方面,笔者及其团队的主要工作是三部专题文集,即分别于2010年、2012年和2015年出版的《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均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具体而言,《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分为三大部

[收稿日期] 2017-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绿党及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现状与态势研究”

[作者简介] 郇庆治(1965-),男,山东青州人,博士,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政治、欧洲政治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①参见:郇庆治.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J].鄱阳湖学刊,2010(2):45-66.

②其具体方法是在“百度学术网”下输入“环境政治学”和“环境政治”这一关键词并限定在“2010—2016年”的时间区间,结果是,属于明确的环境政治学视角下的论著大约在100~150篇(部),而“中国知网”在同样条件下的搜索结果只有39篇和72篇。

分、共 15 章(包括导言和结论),分别在环境政治学视野下探讨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国外绿色左翼运动与理论、东亚生态社会运动与理论等生态社会主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取得的重要进展及其面临的问题;《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共 16 章,分别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社会生态学、包容性民主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等欧美“红绿”政治理论流派进入 21 世纪以来取得的重要进展及其面临的挑战;《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共 17 章(包括导言和结论),分别阐述了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与环境全球(公共)管治等欧美“浅绿”政治理论流派进入 21 世纪以来取得的重要进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其一,这三部文集不仅各自构建了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左翼政治理论”“生态资本主义”等核心概念的意涵界定及其分析框架<sup>①</sup>,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了对环境政治理论(思想)的“深绿”“红绿”“浅绿”三个维度下的立体架构。其二,《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还出版了它的英文版<sup>②</sup>,并产生了良好的国际与社会影响。

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著作还有:一是肖建华著的《走向多中心合作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该书运用公共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集体选择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观点方法,从理论上深入阐释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提供环境公共产品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不仅阐述了欧美国家中随着环境多重治理需要凸显而发生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架构的创建过程,而且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对于进一步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与社会积极参与的生态环境多中心合作治理体系的系统性看法。略显不足的是,该书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层面上的规范性分析,相对缺乏对国际(全球)和我国的多中心合作的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的经验性(个例)考察。

二是张淑兰著的《印度的环境政治》(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张淑兰教授长期从事印度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研究,著有《印度拉奥政府经济改革研究》《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译著)等。除了导言和结语,该书包括 6 章,分别是“印度的环境问题:历史与现实”“印度的环境主义”“印度的环境运动”“印度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印度政府的环境管理制度”“印度政府的环境外交”。该书是国内尚不多见的系统性阐述发展中国家环境政治的国别性学术专著,而且较为完整地涵盖了环境政治研究的各个对象性方面。当然,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对于其中单一议题的阐述显得有些简略或单薄,包括作者非常熟悉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

三是徐再荣等著的《20 世纪美国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该书基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视角,并借鉴环境科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与方法,综合考察了 20 世纪美国环保运动和环境政策的缘起、形成和发展进程,着重分析美国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美国环境保护中的经验教训,其基本看法是,20 世纪美国的环境保护历程,不仅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范围日益扩大和干预方式不断调整与创新的过程,也是美

<sup>①</sup>参见:邹庆治.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论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5):89-96;邹庆治.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述评[J].江汉论坛,2006(2):13-18;邹庆治.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3):127-139;邹庆治.21 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2):108-128.

<sup>②</sup>See HUAN Q Z. Eco-socialism as politics: rebuilding the basis of our modern civilization[M].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0.

国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展深化的过程,而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之间的互动演进又要从更大范围内的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及其变化来阐释。除了导论,全书分为9章: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和环境政策溯源、进步时代的环保运动和环境政策、新政时期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环境政策、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环境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里根政府的环境政策变革和克林顿政府的环境政策。作为标准的欧美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国别性学术专著,该书的最大特色是材料丰富、引证充分(总计43万字),而对于环境运动与国家政策之间政治互动的理论分析要稍弱些。

四是卢洪友等著的《外国环境公共治理:理论、制度与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运用成熟的环境公共治理理论、法律制度与管理模式,并借鉴环境哲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选择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与德国五个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和印度这两个与我国有着更多相近之处的转型国家作为个案样本,具体分析了它们的环境公共治理理念、制度与管理模式上的特点,旨在为推进我国的环境公共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提供参考。该书的主要优点是,着重介绍了这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和俄罗斯)环境公共治理中对于我国的可资借鉴之处,例如,如何制度性鼓励企业和公众的社会政治参与,而不是泛泛而论。当然,这种写作方式也注定了整书结构上的明晰性或略显呆板(导言、结论和7个实例分析)。

五是刘海霞著的《环境正义视阈下的环境弱势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的基本理论设定是,环境弱势群体是指现实中那些在环境资源享用、环境污染负担和环境风险分配等方面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而又无力自主改变现状的社会群体,在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短期内难以被根本扭转的情势下,这一群体的受害程度最为深重,因而呈现为明确的环境非正义现象;环境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理应成为环境伦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关注的焦点,也应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点之一。依此,作者在从事大量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例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概括了我国环境弱势群体的基本状况和主要诉求,并提出了强化我国环境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有关政策建议。该书共分为6章和结语:环境弱势群体概述、环境正义理论综述、我国环境弱势群体现状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国外经验、环境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政策建议。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展现了作者力图以发端于欧美国家的环境正义理论为基础构建我国现实环境政治议题研究的独立分析框架的明确努力,但总的来说作为结果(同时作为全书分析前提)的“环境正义视阈”仍显得不够精致。

六是冉冉著的《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基于田野调查中的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尝试超越中国研究中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理论范式,而是从公共政策执行分析视角来描述、解释和分析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机理,并以此来回应环境政治学中关于环境威权主义抑或环境民主的争论,认为环境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机理深刻嵌入在威权主义系统的政治逻辑和结构中,因而要改善中国环境治理的水平,纠正地方政策执行偏差,就需要实现中国环境政治从威权主义向民主制的转型。全书分为7章,即当代中国的环境与政治;环境政策制定系统及其环境政策的特征;环境政策执行系统:行动者与权力结构;政治、物质与道德激励:中央政府如何激励地方环境政策执行者?环境政策执行结果的“体制内”监督与反馈;全球环境政治情境下的中国地方环境政治;中国环境政治的转型:环境威权主义还是环境民主?(其中第1章和第7章

是引言与结论) 该书既是对我国现今环境政治现实的一个生动肖像刻画,也是基于博士论文的环境政治学研究专著的范本或模板——从问题设定、方法论构建到文献资料使用都是如此。

七是朱狄敏著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实践探索和路径选择》(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5 年版)。该书立足于国家现行制度框架,结合 2014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系统总结了环保公众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研究文献、典型案例和技术标准以及浙江嘉兴在推进环境治理过程中促进公众参与的实践经验,并从社会治理理论、协商民主理论、行政法治理论等不同视角做了阐释。全书包括 4 章: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概论、地方环保公众参与探索、环保 NGO 对公众参与的引导推动、国内外环保公众参与典型案例,并收录了与环保公众参与相关的国内法规文件、国际公约等。

## 2. 代表性论文

在这方面,笔者及其团队的主要工作体现在如下 6 篇论文:一是发表在《绿叶》2010 年第 10 期的《中国的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功能与局限》。政府管理体制架构是国家环境政策及其落实——即“环境国家”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该论文以位于广州的环境保护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为例,对我国自 2006 年起通过设置六大区域中心来尝试的垂直管理体制变革做了初步分析,在概述我国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制度的创建过程、组织结构和监管职能的基础上,详细叙述了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的实际运作状况,尤其是它所取得的治理成效以及面临的诸多难题,阐述了进一步改进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管治绩效的政策选择及其制约条件,从而彰显了我国环境保护监管体制纵向强化或重建过程中的内在复杂性<sup>[1]</sup>。

二是发表在《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的《“政治机会环境”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政治机会环境”是环境社会运动理论分析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或路径。该论文所探讨的是,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分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因为 2007 年以来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尤其是登记制度),至少从理论上说为其提供了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相比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活动空间,但在现实中,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并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 2010 年前后明显增多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传媒与大众批评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自身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sup>[2]</sup>。而长期从事环保教育与传播的青年活动家霍伟亚对该文所做的回应也是十分明确的,即过去以环保团体为主角的公众参与格局的确正在被打破,但他们作为体制外行动者首先关心或遵循的仍是环保组织的“生存逻辑”<sup>[3]</sup>。

三是发表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3 年第 2 期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再阐释与落实困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 1992 年后国际气候治理(谈判)框架的基石,但却显然不是毫无争议的或可以自动得到贯彻落实的。该论文的主要看法是,如果说环境国际公约或“国际共识”谈判中各成员国政府的立场本身就是国内政治环境与竞争性力量制约之下的结果,那么,各成员国政府对所达成国际共识的再阐释与落实也会深受不断变化着的国内政治环境与竞争性力量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缺乏来自国内外环

境公民社会的充分而强大的压力,成员国政府将很可能成为环境国际共识再阐释与落实中的“理性选择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原则本身的弹性或“缺陷”来捍卫本国的短期利益。以中国为例的分析表明,缺乏来自民间力量实质性推动的中国政府更容易坚持一种拒斥共同性、长远性和领导性责任维度的政治认知与政策立场,而以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为标志,民间环保团体似乎也更加趋向于采取一种与政府合作的立场,并得到了来自政府相关部门方面的积极性回应<sup>[4]</sup>(当然,这种分析进路对于解释2015年《巴黎协定》以来的国际气候政治——包括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恐怕需要做出某些调整)。

四是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的《雾霾政治与环境政治学的崛起》。与标题可能给予的预期不同,该论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探讨城市雾霾现象频发对于我国环境政治参与实践的促动作用,而是着力于对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环境社会科学学科的一般性理论阐释。该论文的基本看法是,如果把环境政治宽泛地界定为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政治性理解与应对,那么,其至少包括历时性生成与现实表现两个不同侧面。相应地,环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界定或描述:一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属下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二是比较政治学属下的一个议题政治学科分支。环境政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已经有着40多年的历史(始自20世纪70年代初),而环境政治学作为一门政治学分支学科或环境人文社科学科也已有着20多年的历史(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但无论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实际成效,还是自身发展的趋向与可能性上,环境政治(学)都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sup>[5]</sup>。相比之下,该论文是对环境政治学所做的最为系统的学科视角下的阐述<sup>①</sup>。

五是发表在《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期的《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欧洲绿党:以中东欧国家为中心》。绿党尤其是欧洲绿党政治是笔者长期追踪研究的一个议题领域,而绿党的欧洲化或欧洲绿党的发展则是其中一个给予特别关注的方面<sup>②</sup>。该论文的主要结论是,单纯从选举结果来看,欧洲绿党是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最为“稳定”的主要政党。鉴于并非特别有利的竞选政治机会环境,与上届大致持平的结果是总体可以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绿党的成功入选,就成为欧洲绿党在本届议会选举中的最重要收获或“靓点”——中东欧国家绿党政治达到了过去十年来渐进复兴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高点,而欧洲绿党也因此呈现为一个更加欧洲化的欧洲党,尽管我们目前还不能轻易做出一些更为一般性的推断<sup>[6]</sup>。

六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的《“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碳政治”或气候变化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环境政治的焦点,而它在2015年末的联合国巴黎会议前后显然遇到了一个重大历史性节点——世界性领导权转移的背后是国际治理架构与话语体系的重构。该论文的特色或贡献就是致力于对全球气候变化政治的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分析,其主要观点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国际“碳政治”所展现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或本质,是少数西方国家延续与拓展其历史形成的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础

①参见:邹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1-3;邹庆治.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1-3.

②参见:邹庆治,王聪聪.近十年来西方绿党政治研究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14(1):98-105;邹庆治.作为欧洲党的欧洲绿党: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为例[J].欧洲研究,2009(6):59-71.

上的国际等级化优势或排斥性霸权的表现,也是国际社会创建一个公平、民主与有效的全球气候或环境治理体制的内在性障碍。基于此,已然进入一个历史性复兴进程快车道的当代中国,理应也能够对后京都时代或巴黎时代的全球“碳政治”话语与实践的实质性重塑——同时在构建全球性生态逻辑和实现“生态帝国主义”逻辑超越的意义上——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当然,在可预见的将来,一种新型全球“碳政治”的世界领导者对于中国来说,仍将首先是一个话语性领导者,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内境域中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实成效将是最有力的支撑性因素<sup>[7]</sup>。

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论文还包括:一是孔凡义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的《国外环境政治研究:现状及其评价》。该论文将环境政治界定为对环境问题的政治学视角下的思考,并从国际社会层次(超国家环境政治的研究)、政体层次(环境政治制度研究)、政策层次(国家环境治理政策研究)、市民社会层次(环境非政府组织研究)和公民层次(环境公民权研究)五个方面对主要是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研究进展做了较为系统而科学的概括<sup>①</sup>。然而,它对于欧美环境政治研究的学科融合不够、西方中心主义和研究对象单一等的批评多少有些过于苛刻或牵强。

二是李蕙岚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年第 1 期的《科尔曼生态政治学的历史解释维度》。丹尼尔·科尔曼的《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sup>②</sup>,是为数不多的中译本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著作。该论文将科尔曼的主要观点概括为,全球环境之所以一直走不出“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的怪圈,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及其权力的过分集中。相应地,大力倡导“积极公民”观念,以“参与型民主”取代目前的“对立(竞争)型民主”,乃是构建一个新型绿色社会的政治“基石”。应该说,这种对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学思想的归纳是大致准确的,但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原则(唯物史观),并促进了环境政治学研究范式从“浅绿”向“深绿”的转换,似乎有些过于武断或缺乏论证——批评资本及其霸权显然属于“红绿”的范畴。令人遗憾的是,笔者还意外发现了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的论文《科尔曼“绿色社会”的生态政治学维度》,它的内容提要与李蕙岚一文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就是来自西南大学的学者。

三是刘贺青发表在《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的《试论环境政治学的两大分支及其关系》。该论文在具体阐述环境问题、环境政治和环境政治学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环境政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或议题比较政治学科,因而也理应成为我国培养环境科学和管理人才的必修课程之一。在此基础上,该论文将环境政治学划分为国内环境政治和国际环境政治两个分支,并从理论与实践互动的意义上阐述了它们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国内外的环境政治研究者及其著述的确都可以大致划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群组,但如果一般性讨论环境政治学的学科分支似乎还是按照它的研究对象来划分更为稳妥可靠(即理论、运动与政党、政府与政策、国际治理与合作)。

四是刘然发表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3 年第 2 期的《用中国传统政治学概念分析环境自主治理的可行性》。该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即“道”或“道

<sup>①</sup>相比之下,围绕着公民参与视角而展开的对西方环境政治发展进程的另一种概括(即环境抗议阶段、绿色运动阶段、公民环境治理阶段),就显得有些不够准确。参见:党文琦,奇斯·阿茨.从环境抗议到公民环境治理:西方环境政治学发展与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16(6):133-141.

<sup>②</sup>参见: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术”,包括天道、人道、治道,其中“治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相类似。因而,中国传统政治学可以概括为一个包含两个层面的体系架构:由天道、人道、治道及其相互关系探讨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以及以礼、乐、政、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的制度设计。相应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如道家的生态思想可以为当前依然处在萌生阶段的环境自主治理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的绩效和促进环境治理制度的完善。该论文的最大亮点或贡献是明确提出了我国生态传统文化的时代或全球价值问题,即如何融入并促进一种全球性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现实进程,当然,它在论证结构上似乎还可以做得更为顺畅与精致些。

五是任丙强发表在《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的《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环境治理:问题、挑战与对策》。该论文的主要看法是,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近20年来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存在着一系列显而易见的缺陷,不仅离党和国家的环境政策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有明显差距,而且依然呈现为经济发展动力与生态文明建设内在要求之间、环境整体性与治理职权条块分割之间、全球化不断深入与全球环境压力日渐增加之间的较尖锐矛盾或冲突。依此,在他看来,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环境治理,应更多着眼于制度架构与体制机制层面上的创新,如财政分税制(绿色财政制度)、不同区域(层级或流域)协调治理体制、官员绿色考核制度、鼓励公众参与机制,等等。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反思与改进我国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也是该论文的一大亮点,但环境治理本身显然不会因为这样一个新视角的引入而自动改善,尤其是,我国许多地区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或危机已经是长期严重超出其承载与吸纳能力的结果,只能通过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收缩或减缓来有效应对。

六是冉冉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4期的《环境议题的政治建构与中国环境政治的集权—分权悖论》和《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5期的《政体类型与环境治理绩效:环境政治学的比较研究》。前者从区分环境政治学研究的两个基本进路(即政治系统回应环境议题还是环境议题改变政治系统)出发,讨论了中国环境政治的“政治”特质。在她看来,环境政治无疑已经成长为一个包括党和政府在内的多角色参与其中的政治子系统,而作为其中主要行为体的广义的“政府”却面临着双重意义上的“集权—分权悖论”:一是党在环境政治系统决策过程中的绝对权威地位与环境行政过程中职权的碎片化;二是环境政治地方分权的“有责无权”困境。因而,当代中国环境政治的一个重要侧面,是生态环保管理体制的持续深入改革,尤其是逐步克服上述“集权—分权悖论”。后者则从区分环境民主和环境威权主义这两个环境政治的基础性意识形态概念入手,探讨了不同政体类型对于环境治理成效的影响。她的分析结论是,环境威权主义对环境民主的批评主要是在理论叙事层面上的,并未得到有效经验验证的支持,而经验研究仍表明,民主政体下的环境治理绩效要好于威权政体。如何将基于欧美国家经验的环境政治研究成果(理论)应用于包括我国在内的更广泛现实实践,将长期是一个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手段意义上的挑战。就此而言,这两篇论文具有很强的示范价值,而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具体性问题及其看法,如对于环境威权或民主政体的界定和对我国环境政治的双重“集权—分权”特征的概括,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七是李异平等发表在《世界环境》2014年第4期的《环境政治学视角下的“邻避运动”:以茂名PX事件为例》。该论文从明确的环境政治学视角分析了广东茂名PX事件这一较为典型的环境议题大众动员或社会治理危机。围绕着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该论文强调,面对突发性的环境社会政治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主动掌握、分析和引领参与公众的社会心理及其变化,从而在妥善处置

相关利益主体冲突以及可能风险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环境危机化解与应对能力,逐渐增强公众对政府执政的政治信任度。当然,如何在中国环境政治架构与政治文化背景下分析“邻避运动”或环境集体抗争的建设性价值,尤其是促进形成一种更为顺畅与制度化的公众民主参与体制机制,尚需做更大胆深入的探讨。

八是施奕任发表在《国外理论动态》2015 年第 3 期的《气候治理、政治体制与民众意向》。所谓的欧美民主国家并不必然是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天然领导者或积极推动者,这已经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以来的国际环境政治实践所证实,特别是美国政府先后两次退出该条约的履约机制。该论文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气候治理、政治体制和民众意向之间的关系,提出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拙劣表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污名化了民主政治有助于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构建这一广泛性印象或假设,并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气候变化应对的复杂性、跨国性和长期性逐渐消蚀了民众支持减少碳排放的政治意向,而解决之道则是应该通过更为积极的宣传与沟通,促使民众感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关键性,并使之成为国家(民主政府)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与社会基础。该论文正确指出了西方民主国家中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大众政治支持力度不够甚至趋于衰减这一事实,但严格说来,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仍有所区别,不宜做一种整齐划一意义上的结论性判断,而且政府扩大宣传教育也未必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九是王彬彬等发表在《政治学研究》2015 年第 5 期的《生态补偿的制度建构:政府和市场有效融合》。创建合理有效的生态补偿制度,既是可以更多考虑引入社会资本与市场化机制的生态治理领域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该论文系统探讨了国内外生态补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认为它在欧美国家萌发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庇古税”,并逐渐形成了基于市场机制的科斯型生态补偿和基于政府干预的庇古型生态补偿这两种基本制度范式,而在全球生态治理转型的背景下,生态补偿制度正呈现出市场与政府之间深度融合的趋势;但相比之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长期奉行“单一政府主导”模式,并因而呈现出生态治理绩效和生态创新效率边际递减等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他们看来,我国应着眼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生态环境成本的市场化、全产业链的综合补偿,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与分类补偿,推进环境保护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强调与强化市场机制在全国生态补偿制度创建中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作为一项国家基础性的环境公共管理制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性保障制度,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或主角地位恐怕是很难替代的。

十是黄晗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的《治理尺度的变迁及国家角色再认识:中国空气污染治理的政治学思考》。空气污染政治以及雾霾政治,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最显性的环境政治。该论文实例探讨了空气污染问题所触发或彰显的国家治理正在和即将面临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如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系、国家治理体制及其困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认为空气污染及其治理正在促成现代国家在治理尺度上同时向上、向下、向外三个维度上的扩展,相应地,国家的功能形态和角色定位将会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保障型国家”。毋庸置疑,当代国家正在演进成为一种环境国家、可持续性国家或治理型国家,也就是该文所指称的“保障型国家”,依此而言,该论文正确指出了这一发展趋势并阐述了空气污染治理在其中扮演的催生性角色,



只是作者似乎并未清晰意识到现代国家的这种绿色转型意蕴。

十一是李翔发表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的《面向绿色发展转型的政治学分析》。应该说,无论是全球环境治理还是绿色发展转型的话语与政策,都具有明确的跨国或全球政治意蕴,而2012年“里约+20”峰会所讨论的议题和目标以及旨在制定2020年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巴黎大会的召开及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给人的印象却都是集中于绿色经济(增长)、绿色市场和绿色投融资等方面。该论文指出国际社会对绿色发展转型进程中政治维度的忽略或回避,强调这一过程包含着经济制度与政策变革倡议背后更深层次的政治力量博弈和转换,如何界定绿色、谁来主导绿色转型、选择何种转型路径等,这些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在此基础上,论文具体分析了绿色发展转型的政治内涵、动力机制、可能的路径等方面,从而为我国乃至全球绿色转型的审思提供了一个明晰的政治学视角。当然,绿色经济目标或绿色金融创新本身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或市场(资本)现象,而是遵循或隐含着现行国际经济社会秩序下的政治力量格局或内在逻辑,只是不便(愿)公开言明而已。

十二是三篇代表性的博士论文,它们分别是范俊玉的《政治学视阈中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以昆山为个案》(苏州大学,2010年)、曹顺仙的《中国传统环境政治研究》(南京林业大学,2013年)以及冷晓玲的《欧盟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德国环境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

《政治学视阈中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以昆山为个案》基于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架构的理论设定,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主要考察对象,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特点、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政府在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各级政府环境意识和政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总体状况正在迅速改善。与此同时,各类企业、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也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作为我国经济百强县之首的昆山市,其工业现代化水平走在了全国前列,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巨大张力或矛盾。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背景,昆山市围绕着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协调发挥政府与非政府角色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也面临着不少现实性困难。

《中国传统环境政治研究》以夏商至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环境政治的产生、发展和演进为研究对象,重点阐述了传统环境政治的历史发展、主要思想基础、运行原则和机制、环境保护法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等内容。该论文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对“环境政治(学)”尤其是“传统环境政治”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在对我国传统环境政治发展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重点归纳与分析了儒、道、佛、法四大思想流派关于环境政治的基本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流互动、交锋交融;初步揭示了不同社会政治形态下传统环境政治得以运行的原则和机制,等等。明确地从环境政治(学)视角系统归纳与分析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环境知识(智慧)是该论文的最主要特点或贡献,对于拓展与深化我国的环境政治和传统生态文化研究都具有一种引领意义。

《欧盟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德国环境政策研究》系统论述了德国环境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德国《基本法》框架内和欧盟框架内的环境政策取向以及它所涉及的范围和手段,其核心观点是,德国环境政策是一项综合性政策,包含了与环境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外交等丰富内容。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项政策经历了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反映了国内主要政治团体的博弈、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其中,作为德国最重要的环境政治力量的“绿党”及相关政治团体,不仅在德国,也在欧盟各个国家,成为一种重要的绿色政治力量。德国环境政策所反映的先进环境理念、高效决策机制、合理职能定位、明确责任追究、广泛社会参与等一系列要素,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德国环境领域中的贯彻执行,是环境政治理论在德国各个层级和方面的成功实践。这不仅使德国成为欧盟乃至世界范围内环境政策的热情倡导者和先行者,使德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明显走在全世界的前列,而且使德国在国际环境政治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

## 二、国外名著译介

在这方面,笔者及其团队的主要工作是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于 2012 年编辑出版的“环境政治学译丛”的第三辑。

一是马丁·耶内克和克劳斯·雅克布(主编)的《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李慧明、李昕蕾译)。该书作者是德国版本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构建者,其中马丁·耶内克曾是联邦德国国家环境政策委员会顾问,著有《环境革新的大趋势:工业和国家的生态现代化》(2008 年)、《结构转变的生态向度》(1993 年)等,而他们所在的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FFU)自 1986 年创建之初就一直是该理论的积极倡导、传播与政策应用中心。该书是研究中心成立 20 周年之际编辑的专题文集,比较完整地论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蕴涵的政策创新、技术革新和示范扩散等方面,并在全球视野下重新思考了先驱国家与跨国管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分为五大部分:生态现代化与先驱国家的作用、环境政策革新的扩散、环境管治的里约模式及其革新、能源政策的绿色整合和国际环境管治。可以说,该书是对德国版本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最完整与权威性阐述,对于我国正在推进的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是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邹庆治译)。该书作者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政治系教授、国际著名的生态主义政治理论学者,著有《环境主义与政治理论:走向一种生态中心主义方法》(1992 年)、《政治理论与生态挑战》(合著 2006 年)等。针对环境政治学界所一直批评的主权国家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或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无能无为,该书着重探讨了如何创建一个绿色的民主国家来取代古典的自由民主国家、严重依赖增长的福利国家和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竞争国家。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依然是生态环境问题现实应对中的重要政治制度,因而应把绿化国家作为绿化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或步骤。该书的主要特色是试图把环境运动的道德与实践关切和当代政治理论如对国家、民主与正义的思考结合起来。因而,它是试图从一种“批判性政治生态学”(承认人类共同体是大自然共同体的构成部分因而理应成为我们道德关切的对象)立场出发,将自由民主制国家转型成为一种后自由主义的绿色国家的理论尝试和代表性著作。

三是马克·史密斯和皮亚·庞萨帕的《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与公民参与》(侯艳芳、杨晓燕译)。马克·史密斯是英国开放大学教授,著有《生态主义:走向生态公民权》(1998 年)、《负责任的政治:结合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可持续性》(2012 年)等。该书从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的视角,系统探讨了环境与生态公民问题的相关学术争论。它试图阐明,对环境灾难、非正义和其他形式风险的意识,只有在拥有一种明确的政治变革战略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但令人遗憾的

是,现实中的环境运动日益拘泥于国家的、区域的和政府间的“管治国家”。因而,该书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系统探讨责任、正义与环境的较具代表性的著作。

四是罗尼·利普舒茨的《全球环境政治:权力、观点和实践》(郭志俊、蔺雪春译)。该书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著有《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环境管治:从地方到星球的自然政治》(1996年)、《全球环境政治中的国家与社会权力》(合编,1993年)等。传统全球环境管治更多地倾向于采取国际政治的结构与关系的视角,相应地,所有环境难题的解决方案都只能是退让、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种自上而下的星球管理。但是,罗尼·利普舒茨在该书中对此提出了挑战,认为我们只有超越传统的冲突与合作政治模式才能真正认识到环境难题的“根本”之所在。在该书中,罗尼·利普舒茨提出了一个分析当代环境难题的本体论、物质条件和权力关系框架,并对目前的应对全球环境难题和保护世界自然资源的努力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他既用大量的事实表明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破坏后果,同时也强调我们普通个体作为商品消费者与污染制造者的具体责任。

除此之外,特别值得关注的译著包括:一是201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佩特拉·多布娜(Petra Dobner)的《水的政治:关于全球治理的政治理论、实践与批判》(强朝晖译)。该书德文版发表于2010年,从不同视角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性水资源危机做了深刻剖析,阐述了水政治重点从公共生存保障向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变,并详细介绍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学理论,是迄今为止尚不多见的水政治专题著作。全书共分为9章,即浊流与蓝金:全球饮用水危机;世界水资源会议:历史回顾与中期结论;“最后的底线”抑或最后的希望:饮用水私有化和商品化;全球水治理: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回顾公地问题;公共福祉与私有化;21世纪的政治与民主;与水政治相关的全球公共政策网络;理论总结:对公共利益的担忧。该书的最大亮点或贡献,并不是对水资源的全球治理重要性的关注,而是从全球民众公共福祉和民主权利的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当今时代的自然与生态的市场(资本)化开发和保护进路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二是2012年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约瑟夫·绍尔卡(Joseph Szarka)的《法国环境政策的形成》(韩宇译)。该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02年,主要探讨了法国所面临的代表性生态环境问题、政府对这些议题的政治应对、包括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相关行为体在环境政策制定实施中的角色、政府环境政策与欧盟的关系、环境政策的效果评估等。可以说,由于环境议题及其应对的交叉性特点,该书也是对当代法国政治及其绿化进程的系统性描绘。全书分为理论和案例两大部分,共10章(包括结论):环境政策分析理论框架;法国的公众意见、环保运动和环保组织;法国政治体系中的环保党派;法国政体、机构能力建设和环境;欧洲环境政策与法国;自然环境:保护自然还是特殊利益;工业环境:“指挥控制”还是合作主义政策;民生环境:政策网络的拓宽;走向可持续发展;结论。

三是2016年由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的罗伊·莫里森(Roy Morrison)的《生态民主》(刘仁胜、张甲秀、李艳君译)。罗伊·莫里森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学者(能源技术专家),而他之所以为中国学界熟知也并不是因为《生态民主》一书对于“生态民主”的论述,而是其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该书的英文版发表于1995年,分为三个部分,共10章(包括导言和结语)。第一部分(1~3章)阐述了工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分析了当代工业文明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并探讨了工业主义的后果及其困境;第二部分(4~6章)则首先讨论了作为工业主义替代选择之一的全球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然后转向作为工业主义另一种未来竞争者的新型救赎性威权主义秩序的

崛起;第三部分(7~10章)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民主及其发展,具体考察了三个业已存在的合作社制度案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诸多转型突破点。

四是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观察研究所2014年度报告《世界现状报告2014: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谢来辉等译),该报告是国际著名智库“世界观察研究所”自1984年以来的第30个连续性年度报告,也是庆祝该研究所成立40周年以及该研究所创始人、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八十周岁的专刊。它秉承了该系列报告30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质量和思想深度,把“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作为主题,深入剖析了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的现状以及所存在的挑战和希望。该报告在内容上分为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两大部分,分别从哲学、文化、历史和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详尽分析了各种全球治理行为体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议程与政策中的作用。鉴于联合国于2015年所达成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或“可持续发展政治”将会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国际)环境政治议题领域。

### 三、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

总体而言,国内环境政治研究机构近年内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也缺乏特别有影响力的标志性学术活动。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自2016年起逐渐恢复正常的学术活动,并在2016年9月25日和2017年5月6日组织了两个小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前一个会议议题为2016年环境政治发展研究论坛暨“绿色发展与中国环境治理”研讨会,强调重新激活的研究所及其年度性论坛将致力于为环境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搭建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尤其是建立省内环境政治研究学者的“朋友圈”,并围绕着“绿色发展与中国环境治理模式”“绿色发展与中国国际环境战略”“绿色发展与环境政治学反思”“绿色发展与环保社会组织”等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后一个会议议题为“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视域下的能源—粮食—水纽带安全及中国应对”研讨会,强调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能源、粮食和水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极具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安全纽带,在此背景下,原来相对分离的政策模式已无法有效适应三者互动所带来的新挑战,因而国际社会必须加强能源、粮食和水资源领域的协同治理。可以想见,同时受学科建设规划要求和自身财源约束的影响,该研究所及其关注重点将会日益转向全球气候变化与国际环境政治议题,并且更多在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机构框架下来展开。

湖北大学生态政治研究所(中心)是成立于2010年并挂靠在该校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的虚体性研究机构。近年来,刘然教授及其团队围绕着西方生态政治学、生态政治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研究的中国进路等议题,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在《国际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江汉论坛》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了50多篇学术论文。目前,他们正致力于《生态政治学概论》(暂名)教材的编写,而这很可能是我国高校环境政治学学科的第一本教材<sup>①</sup>。

此外,笔者于2009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创建了“北京大学环境政治研究中心”,并组织一个不定期的“北大环境政治论坛”,迄今已先后邀请了包括德国绿党前主席Reinhard Bütikofer(2010

<sup>①</sup>中山大学王学东博士曾在2013—2014年组织过国内相关高校老师编撰题为《环境政治学导论》的教材,并邀请笔者撰写其中的导论和结语,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未完成。

年)、欧洲绿党时任主席 Philippe Lamberts (2011 年/2014 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中心首任主任 Martin Jänicke 教授 (2011 年)、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黄瑞祺研究员 (2011 年)、欧洲议会左翼党团时任主席 Gregor Gysi (2014 年)、英国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 Dominic Roser 博士 (2015 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Josef Baum 教授 (2015 年)、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王作跃教授 (2017 年) 等在内的多位国内外知名人士 (学者) 作学术报告或进行学术交流。

在学术会议方面,笔者及其北大团队主办了 2015 年 6 月 26—27 日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中国绿色左翼研究”研讨会和 2014 年 7 月 13—15 日的“多学科视野下的环境挑战再阐释”中德研讨会。前者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共同举办的,与会代表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案例研究”“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工作规则与研究议题”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这表明,经过几年的准备与过渡之后,北京大学的环境政治研究逐渐转向国际绿色左翼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这一明显具有“红绿”色彩的议题领域,而且围绕着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关于“社会生态转型与全球绿色左翼重构”的合作主题框架来展开。后者是由北京大学(环境政治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并得到了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资助。会议从广义的环境政治学视角围绕“环境挑战再阐释”“全球气候变化管治和中国角色”“比较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环境政治和政策比较”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与对话。

另外,北京大学环境政治研究中心还分别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2010 年 4 月 27 日主办了“新形势下中国环境运动的战略选择”和“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小型座谈会。前者与《青年环境评论》杂志社合作,包括“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等在内的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与从事社会政治运动研究的学者就中国环境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与机遇、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抗争事件关系、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与战略转型等议题进行了对话研讨,而其直接成果是发表在《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两篇商榷性论文;后者主要就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其学科发展的近期前景做了交流对话,并就如何促进该新兴交叉学科的尽快成长特别是与其他主流学科比如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借鉴吸纳做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吴逢时和笔者分别介绍了关于中国大陆环境政治学发展状况的长篇述评<sup>①</sup>,而张海滨则着重介绍了中国政府参与哥本哈根全球气候谈判前后的相关情况。

除此之外,需要提及的还有其他三个重要的制度性推动力量。一是清华大学自 2008 年起开始主办的年度性“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2010—2016 年间的 7 次会议中,几乎每年都有 3~5 个“环境政治(学)”方面的议题。例如 2010 年会议有“低碳时代的能源安全”“现代政党的功能变化及其挑战”(上下)3 个小组论坛;2014 年会议有“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的全球环境治理:理论与实践”“海洋争端与合作:法律、战略与国际关系”“环境政治博弈:国内状况与国际经验”“中国能源需求和地缘政治:中俄油气合作及其背后”“环境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政治’”5 个小组论坛;2015 年会议有“世界秩序变革视角下的绿色能源转型、再工业化与绿色化”“海洋争端与合作”“气候变化与跨国环境治

<sup>①</sup>参见:邹庆治: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J].鄱阳湖学刊,2010(2):45-66;WU F S.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China: an issue area in review[J].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2009,14(4):383-406.

理”“全球气候政治研究新进展”4 个小组论坛。如今,该年度会议已经成为我国青年政治学者包括环境政治学者的最主要的开放性展示平台或“秀场”。

二是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自 2013 年起联合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环境论坛”。首届论坛的主题是“环境问题演变与环境研究反思”,并特意邀请了包括环境政治学在内的 8 个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代表。因而其目的也很明确,即一是从各学科的角度对中国 30 多年来的环境问题演变状况进行概括,二是对各学科视野下的环境问题研究状况进行反思。而从中得出的结论性共识是:环境问题已经从主要是政府的个别部门和自然科学领域关注的技术与工程类的问题演变成为全社会都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然而,我国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总的来说还处于一种低水平生存和严重不均衡的状态<sup>[8]</sup>。经过随后 3 届的持续努力,该论坛已明确致力于打造一个促进我国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对话性平台——同时在这一大学科内部以及与环境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对话。对于环境政治学而言,该论坛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使得我们在保持一种环境知识与认知开放性的同时,更加自觉地从政治学的视角与方法来分析探讨那些共同性的现实问题或研究对象,如何思考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或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三是《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鄱阳湖学刊》《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绿叶》《国外社会科学》等创办或连续举办的“环境政治研究”专栏。它们的共同特点或贡献在于,明确地把环境政治学这一相对弱势学科或方向作为一个不定期常设栏目,因而具有明显的学术规约或引领作用。例如,《鄱阳湖学刊》2010 年第 2 期的“环境政治学”专栏、2014 年第 1 期的“环境政治学”专栏、2015 年第 2 期和第 3 期的“环境政治研究”专栏、2016 年第 1 期的“环境政治研究”专栏;《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和第 4 期的“环境政治研究”专题、2014 年第 1 期的“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专栏、2015 年第 1 期的“环境政治”专栏和第 2 期的“环境政治学”专栏、2016 年第 1 期的“环境政治”专栏;《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的“环境政治学研究”专栏和第 3 期的“国外环境政治研究”专栏、2016 年第 1 期的“国际环境政治研究”专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年第 3 期的“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专栏;《绿叶》2013 年第 4 期的“生态主义的政治光谱”专栏;《国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的“国外生态理论研究”专栏,等等。

#### 四、简短评论

通观 2010 年以来的我国环境政治研究,应该说,理论著述方面的成果或进展显然要更为扎实。具体而言,无论是对于国外环境政治议题的研究,还是对于国内环境政治议题的研究,都有值得关注的论著发表。例如,北京大学团队对于欧洲绿色左翼政治的研究、山东大学团队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和生态现代化议题的研究以及徐再荣关于美国环境运动和环保政策演进的专著、冉冉关于中国地方环境政治的专著、张淑兰关于印度环境政治的专著,等等,都体现或代表了我国环境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并初步具备了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相比之下,国外名著译介、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两个方面只能说是平稳推进,但亮点不够多。国外名著译介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年推出的“环境政治学译丛”的第三辑,但此后并无新的后续翻译出版计划,而其他环境政治著作的翻译都是作为一种“副产品”而完成的,其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都大打折扣;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方面,北京大学环境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几次会议或论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国内外

学术影响,但无论就现存研究机构的进一步实体性制度化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学新兴分支学科地位的正式认可或体制化而言,似乎都很难想象任何短期内的突破性进展。

从环境政治(学)研究的四大议题领域,即环境政治理论、环境政党与运动、政府环境政策、国际环境治理与合作来看,欧美国家的环境政策及其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及其谈判,无疑是我国学者最为关注、学术成果也最为丰硕的两个议题领域<sup>①</sup>。应该说,这大致公平地反映了我国在生态环境议题领域——同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仍然是一个国际学习者的客观现实。正因为如此,张淑兰对于印度环境政治的国别分析、刘海霞在环境正义理论视阈下对国内环境弱势群体的分析、刘然关于我国生态传统文化对于环境自主治理机制探索独特作用的分析、任丙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环境治理政策及其落实机制分析、曹顺仙关于中国传统环境政治的分析,等等,都首先体现的是我国环境政治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与新方法(尤其是相对于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环境政治学话语体系而言)。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国内学者对于环境政党(绿党)和运动的研究,依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只有非常有限数量的较高水准的个例或比较性案例——如李异平等关于茂名事件的环境政治学分析。

因而,一方面,我国环境政治研究的主要阶段性进展或提升,是环境政治学同时作为一个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比较政治分支学科的事实性确立。这意味着,它不再简单是一个关于国外(欧美)的环境政治理念、环境政党与社会运动、政府环境政策、全球环境治理的“外来性”理论或学科,而是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已然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部分的主体性认知与实践。换言之,随着中国环境政治(学)逐渐成为世界环境政治(学)发展进程及其理论构建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我们正在迅速告别环境政治学初级发展中的以译介评述为主的模仿与学习阶段,而转向一个建立在环境政治学中国化基础上的以自主性研究为主的新阶段。这不仅突出表现在我们更为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也体现在我们讨论各种问题时更加自觉的中国立场以及所使用的中国话语及其言说方式。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确宣布,环境政治学在我国的独立学科地位已然确立,尽管它依然缺乏官方认可的教学、研究与学术交往上的制度化或体制内形式。

另一方面,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未来成长与发展,还将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挑战与困难。高校教学与科研架构中的“体制外”地位所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必将继续影响着环境政治学年轻学者的培养与吸纳,而任何缺乏持续性人力资源支撑的新兴学科都很难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在目前形势下,如何做到吸引更多来自环境哲学、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学与环境法学以及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青年才俊,关注与加入环境政治学的学术研究网络,也许是一条较为现实的路径。而在笔者看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我国环境政治及其研究的时代主题。正如笔者在他文中所指出的,发展的绿化将长期是我国环境政治的实践与理论主题<sup>[9]</sup>。它的确表明,进入经济社会现代化中后期的当代中国正在造就一个有利于环境政治及其研究发展的“政治机会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政治及其研究应当追求或将会迎来一种大众认知和定位的根本性改变。可以说,像绝大多数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环境政治学不太可能成为当今时代的“显学”,甚至可以说,环境政治及其研究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它相对于当今世界主流经济政治架构及其基础性理念的否定或超越立场。也正

<sup>①</sup>需要强调的是,前文中的研究综述更多考虑的是那些自觉将环境政治或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或框架来加以讨论的著述,而未能充分涵盖比如环境政治理论中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国际环境治理与合作中的全球气候变化政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些独立性极强的自主性次级研究领域。

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环境政治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是继续保持与包括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等在内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密切联系,并谨慎对待它可能走向的资源经济化或公共治理化的学科发展趋势——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解与应对日益被视为一种可以经济地合理配置与开发的资源和通过公共政策进行调整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再分配,而渐趋弱化直至回避对于生态环境恶化深层成因的坚持追问与清除立场。

[参 考 文 献]

- [1] 郇庆治,李向群.中国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功能与局限[J].绿叶,2010(10):9-18.
- [2] 郇庆治.“政治机会环境”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28-35.
- [3] 霍伟亚.环保组织的生存逻辑遇到挑战:兼与郇庆治教授商榷[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6-40.
- [4] 郇庆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再阐释与落实困境:一种基于对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作用的考察[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3(2):76-85.
- [5] 郇庆治.雾霾政治与环境政治学的崛起[J].探索与争鸣,2014(9):48-53.
- [6] 郇庆治.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欧洲绿党:以中东欧国家为中心[J].国外理论动态,2015(1):98-109.
- [7] 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6(3):24-41.
- [8] 张玉林.环境问题演变与环境研究反思:跨学科交流的共识[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13.
- [9] 郇庆治.发展的“绿化”:中国环境政治的时代主题[J].南风窗,2012(2):57-59.

## A Literature Review on Researche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Since 2010

HUAN Qingzh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oci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With a review on researches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China since 2010, the author found that findings in theoretical masterpiece are apparently more solid, while foreign masterpiece introduction, academic institutes and major academic activities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s being smoothly progressing, without much highlight. Among four major issues in political environment research, namely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parties and movement,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ooperation, the paper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as well as global climate action plan and negotiation undoubtedly attracted most attention and achieved fruitful academic findings in China. Major progress is probably to be made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research. On one h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both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nd bran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will also fac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i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co-politics;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green politics

[责任编辑 章 诚]